



邱崇丙 著

# · 汉语文化论集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汉语文化论集

邱崇丙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汉语文化论集 / 邱崇丙著.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7. 5

ISBN 978 - 7 - 5087 - 1706 - 7

I. 汉… II. 邱… III. 汉学—文集 IV. K207.8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56105 号

---

书 名: 汉语文化论集

著 者: 邱崇丙

责任编辑: 孙晓青

---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话: (010) 66051698 电传: (010) 66051713

邮 购 部: (010) 66060275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

印刷装订: 北京市优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140mm × 203mm 1/32

印 张: 10.125

字 数: 22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

定 价: 25.00 元

---

(凡中国社会出版社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邱崇丙 (Qiu Chongbing), 1932 年生, 江苏淮安人。1958 年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曾任北京经济学院汉语教研室主任, 国家图书馆文献研究员, 北京市比较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已出版作品:《俗语五千条》、《俗语常言词典》、《俗话说得好》、《浮生六记》注释、《千百年眼》译注、《玉盘珠响——唐宋词精品赏析》、《孙子兵法》译解、《吴子兵法》译注等。

参与编撰的图书有:《古代散文鉴赏词典》、《现代散文鉴赏词典》、《应用文写作指南》、《中国小说鉴赏大词典》、《民国时期总书目》、《清代禁书总述》等。

# 前言

本书内容涉及中国文学、语言文字、历史、哲学、美学、宗教、政治、军事、社会人口等，概括地说，就是“国学”，外国人称之为“汉学”。这些文章系陆续写成，有的曾在报纸杂志上发表，有的在互联网上发布。胡敬禹先生为我在yywzw.com上建立过《邱崇丙文集》，后又增加篇章，易名为《汉语与中国文化》专栏。

文章在网上发布，多被转载，每见褒誉，随之而来的是冒名顶替。有的公然攫为己有，署上他自己的大名；有的用一个笔名转载，混淆视听；有的抹去了我的署名，使其版权归属于网站；有的改变题目，剽窃内容。手法不一而足。结果反而有人质疑我是不是原文作者。

《科学派美学丛刊》主编肖世敏先生发来邮件，要我授权将《美的发现》一文收入他的丛刊，他的态度使我敬重。该文已在2006年11月丛刊第四期上发表。希望互联网上能够推广互相尊重的风气，杜绝侵权行为，以利和谐，共同提高。

# 目 次

## 甲辑 古今诗文

- 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外向观 / 2  
诗的意境 / 8  
古诗的格律 / 21  
李白与杜甫 / 27  
长恨歌的主题 / 39  
《枫桥夜泊》的内容 / 42  
《浮生六记》与《红楼梦》 / 44  
俞平伯《浮生六记》校点本复议 / 47  
《风尘落花》序言 / 53  
现代小说与中国革命 / 59  
1949—1980 年散文概观 / 73

## 乙辑 汉字华语中文

- 论汉字的同音现象 / 86  
《识文断字》序言 / 96  
俗语界说 / 100  
俗语与叠映句式 / 107  
俗语修辞格 / 125  
描写技巧例说 / 184



- 附录：雷雨中的一处细节描写 / 191  
叙述的技巧 / 193  
《民国时期总书目》述评 / 205

## 丙辑 儒道法佛

- 孔子与《诗经》和君子 / 222  
文学与历史的结合  
——读骆宾基的金文古史新著 / 237  
《金文新考》与上古史研究 / 240  
释“尧舜禹桀桀纣” / 244  
附录：释“嫪毐”、“豎” / 246  
圣人和愚民  
——老子《道德经》两面观 / 247  
庄子的逍遥游 / 254  
孙武与吴起 / 260  
韩非与秦始皇 / 271  
中国人口的潜意识 / 282  
佛教在中国 / 293  
美的发现  
——美的通俗解释 / 305

甲  
輯

古  
今  
詩  
文





## 中国古典文学中的 外向观

所谓“外向观”，是指对外部世界（国外等）的态度。本文想就中国古典文学中这一类题材的处理，谈几点意见。在谈的过程中，自然不能不涉及中国文化的性质问题。

对中国文化的性质，近百年来一直有不同的看法。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文化属于内陆文化，是封闭性的，内向型的；西方文化属于海洋文化，是开放性的，外向型的。其实内向和外向并不是绝对排斥的，而且无论是内向或外向，又都各有不同的历史内容。

一个民族如果只有内向，没有外向，会把自己封闭起来，陷入孤立落后的境地，美国的印第安人就有这种倾向。一个民族如果仅有外向，没有内向，就将失去集体的力量，吉卜赛人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犹太人就有这种倾向。这都是极端的例子。中国并不是一个谨守内向的民族，我们同时具有外向，而且与西方的外向迥然不同。

中国历史上有过几次重大的外向行动。西汉时代的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促进了汉族与西域各族之间经济文化关系的发展。唐代玄奘，去印度游学，翻译了大量佛教经典，促进了中印之间的文化交流。明代航海家郑和，七次航海到印度洋地区，增进了对这一地区国家的了解并进行互利的贸易。这些行动都没有扩张、侵略、殖民主义的性质。西方的外向行动，在历史上虽也起过开拓作用，但很容易使人想到弱肉强食的动物



本能，而中国的外向行动，是一种和平正义的交往，更富于人类理性，这是中西文明的不同之处。

从自然条件上讲，我们地大物博，无须他求。从思想上讲，儒家的圣人主张怀柔，用中国的文明去教化夷族，不主张征服侵略。而在和平交往中，又能向对方“取经”。我们的文化中已吸收了西域的物产、艺术，印度的佛教，西方的科学技术，这些都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因此，说中国文化是封闭的，内向的，是不全面的。尽管如此，中国的外向进取精神并没有得到进一步发扬，在中国古典文学中也未得到有力的表现。以下分三个方面加以说明。

## 一、政治、文化方面

前面已提到这一方面的事例。张骞出使西域的事，作为题材本可以与荷马史诗《奥德修纪》相比，但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几乎没有反映。唐僧取经的事，作家是注意到了，明代吴承恩写了《西游记》。这部小说的成就在于作者塑造了孙悟空、猪八戒等艺术形象，但与唐僧取经的历史事实并无关系。作者并没有现实地处理这一历史题材，而是用幻想的形式虚构情节。作为艺术形象，唐僧也是慈悲有余，智慧不足，并不是进取精神的化身。

郑和下西洋，罗懋登以此为题材写了《三宝太监西洋记》。作者效颦于《西游记》，以神怪相杂组成情节，靠一个和尚一个道士来逢凶化吉，不伦不类。与《西游记》相比，作者儿无任何新创造，在思想上艺术上，都未能把握这一题材。张骞出使西域一事，被作家所忽视，而《西游记》与《三宝太监西洋记》又未能从正面处理题材，这一情况说明什么呢？说明作家对这一方面的题材还没有意识到它们的历史内



容，未能表现出人物的外向进取精神，他们未能尽到作家的责任。既然长篇小说的体裁已经出现，孙悟空的形象已被塑造，那么作家所缺少的只是思想。

## 二、贸易方面

儒家圣人为封建社会制定了整套的礼制和培养官员的计划，但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轻视生产与货殖。这样，社会上形成的风气是“升官发财”，而不是创业致富。这必然导致腐败。“一任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封建社会的吏治，始终是一个严重问题，也是文学中的突出题材。商业一向被视为末作，商人尽管腰缠万贯，社会地位并不高，这当然要影响到文学形象的塑造。“商人重利轻别离”，他们身上只有铜臭。

《夷坚志》是宋代作家洪迈的一部笔记小说集。其中有一篇《岛上妇人》，题材与外贸商人有关。福建泉州商人去南洋经商，因船触礁，飘泊至荒岛。岛上有一位赤身裸体的妇女，商人同她一起生活了七八年，生了三个孩子。后来偶有同乡商船经过，泉州商人随即登船离去。虽然在情感上有所不安，但终置妇人孩子于不顾，独自回到了故乡。

这个故事有许多疏漏之处，明显地出于编造，仍带有“志怪”、“述异”的特点。而英国作家笛福的鲁滨孙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利用仅有的条件，种出了庄稼，并驯化了一个野人，表现了主人公为生存而拼搏的聪明才智和顽强毅力。泉州商人既未从事生产，又未利用他的文明去感化岛上妇人，而在离开时也没有把妇人孩子带走。这个外向题材，表现的却是保守的性格，毫无进取精神可言。也许宋代外贸商人还处于“没出息”阶段。

明代，中国小说出现了直接描写外贸商人发财的故事。这





里要提到的是《拍案惊奇》中的《转运汉巧遇洞庭红》。

故事是这样的：苏州人文若虚经商，最初极不顺，不得已随友人去海外。他并无资本，仅以一两银子买一百多斤橘子（洞庭红），以便在途中答谢友人。船到吉零国，被当地人高价买去，得银币千余。回程时，避风于一海岛，偶然发现一巨龟壳，拖回船上。到了福州，被一波斯商人用五万两银子买去。从此，他成为闽中富商，建起家业。

这个故事，与《岛上妇人》内容已大不相同，文若虚比泉州商人稍有长进，总算到海外发了一笔财。虽然作者把这归结为时来运转，偶然侥幸，但也多少表现了一点外向的勇气。

清代又出现了描写外贸商人的长篇小说，即李汝珍的《镜花缘》。这部小说所写的海外，其实只是中国社会的倒影。作者将中国社会的种种现象，换了一个地域，转了一个方向，让他们在异国的土地上反常地出现，以收到讽刺的效果。这有点类似英国作家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它虽未真实反映海外情况，但以外贸商人林之洋等为正面形象，却是一个新的进展。内容也不再是偶然发财，而是进行正常的互利的贸易。从泉州商人到文若虚，从文若虚到林之洋，似乎是在表明：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外向意识有所加强。

### 三、时空想象方面

中国古典文学中对外部世界的描写，也不限于域外、海外，也包括世外和宇宙空间。古代神话中夸父曾经追赶太阳，渴死于道中。嫦娥飞向月球，她的寂寞情怀，正是太空飞行孤独感的反映。这些都带有先驱者的悲剧色彩。

西晋人张华《博物志》上还记载了有关“浮槎”的传说。这个浮槎，相当于今天所说的宇宙飞船。这只浮槎由海驶向银



河，到达牵牛星宿。起航后，“十余日中犹观星月日辰，自后茫茫忽忽，亦不觉昼夜”，这是一幅飞离地球的景象。浮槎还能如期返航，说明它不靠神力，而由人操纵。这个故事也许是牛郎织女故事所激发的更大胆的想象，人们已不满足遥望星空，而想亲自去看一看。这是宇宙航行的最早蓝图。

南朝人想象世外有仙境。刘义庆《幽明录》记载了汉明帝时剡县人刘晨阮肇入山遇仙的一段经历。他们得到仙女的款待和爱情，只不过反映了人们的美好愿望。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山中住了十日，回来后，“亲旧零落，邑屋改异，无复相识”，只打听到了七世孙。这就是“山中方十日，世上已千年”的具体写照。

类似的题材，还有任昉《述异记》中“烂柯”的故事。樵夫王质入山砍柴，观看仙童下棋，一局未完，斧柯已烂。王质下山，同辈人早已死尽，原来已过了几世。

“山中方十日，世上已千年。”这句话一向被视为奇谈。这个故事产生以后一千五百多年，爱因斯坦提出了相对论，证明时间是相对的。现在读一读这个故事，不能不对古人的智慧表示敬佩，他们竟然猜中了这一宇宙规律。

这些题材是很宝贵的，它本可以成为自然科学发展的催化剂，可惜仅限于简略的神话传说，没有作家去扩展它，深化它，因而也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综上所述，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原本就有一种外向进取精神，在文学中也有所记录，只是未能得到发扬。为什么会如此呢？从社会基础上看，中国的资本主义还没来得及发展，就遭到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失去了有利时机；从思想上看，儒家主张文以载道，文学只是政治的附庸，作家很少能摆脱这一羁绊。

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固有的外向进取精神将会得到发



扬，中国人的性格将会得到更健全的发展。五四运动前后，鲁迅曾对国民性作过深刻的解剖，当代文学似乎可以迎接一个新课题：塑造能体现外向进取精神的艺术形象。

附记：此文收入《宗教·虚无·性爱·死亡及其他》一书，漓江出版社1993年出版。网上多次被转载。



## 诗的意境

在我国文学史上，诗歌是最早出现，并得到高度发展的一种文学体裁，《诗经》、《楚辞》、乐府、唐诗、宋词、元曲，是它发展过程中的几次高峰。诗歌创作上的成就，为它的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厚的基础。

《尚书·舜典》上说：“诗言志，歌永言。”《诗大序》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礼记·乐记》上又说：“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这些话指出了诗的内容和产生的过程，提出两个重要的概念：物与志。“物”使人心动，产生“志”，说出来就是诗。

到了南朝，诗论渐趋系统化。刘勰《文心雕龙》中的《辨骚》、《明诗》、《乐府》，专篇论述诗歌。钟嵘《诗品》是论诗专著。他们的观点，虽本于前代，但也有所变化。《文心雕龙·明诗》：“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诗品·总论》：“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物”的概念未变，而“志”改用“情”。应该说，情比志更能表述诗歌内容的特点。古代的政治家在诗中大发议论，也可以说是“诗言志”，但这显然不能感人，绝非诗之上乘。诗中之“情”，往往要用形象来体现，它比“志”所



表述的更为确切了。

唐宋以后，诗品词话之书渐多。有的人论诗，又把“物与情”说成“景与意”。以前的所谓物，是外界的物，没有明确指出是否写入诗中，唐宋以后的景，却是写进诗中的物。以前的志，可以理解为思想，情可以理解为感情，唐宋以后的意，却是包括了志和情。欧阳修《六一诗话》引梅尧臣的话说：“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姜白石《白石诗说》云：“意中有景，景中有意。”这一提法不仅不同于物与情的概念，而且也不同于物与情二者的关系，景与意是互相渗透、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此后，严羽《沧浪诗话》提出“兴趣”说，王士禛《渔洋诗话》揭出“神韵”说，袁枚《随园诗话》提出“性灵”说。王国维《人间词话》中又提出了“境界”说。境界，又称意境。境界说的提出，可说是中国历代诗论的结晶，它触及到了中国诗歌创作中的最主要的艺术特点。

## 二

文学作品要创造典型形象，诗歌的创作应追求由生活图景和思想感情融合一致而形成的一种艺术境界——意境。意境，是意与境的浑然整体，不可分割，但为了表述方便起见，我们只好对意和境，分别加以考察。

苏轼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摩诘，即唐代诗人王维。“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就是他的名句。王维的诗中，常有鲜明的画面。这种画面，读者的眼睛，是无法直接看到的，需要根据诗句提供的内容，通过想象从而在脑海中显现出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就是诗句向读者提供的内容，根据诗句的内容，边塞的





壮丽风光，便展现在我们眼前。诗中的画面，是意境的基础，没有画面，也就没有意境。但画面不等于意境。“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楼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这是给孩子们认字习字用的顺口溜，虽然也有画面之感，但并没有意境。画面要成为意境，首先它应该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互相联系。孤烟从大漠上升起，落日接近长河的水平线，这就是互相联系。画面不是拼凑起来的，而是统一的整体。

诗人所描绘的画面，得之于对社会和自然的观察和感受。它可能是从生活中选择来的，也可能是许多生活情景的重叠融合，也可能是诗人的想象创造。诗中画面各部分的联系，不仅是外在的，还应该是内在的，紧密的，合理的，和谐的。画面越是有紧密的、合理的、和谐的内在联系，它就越生动，给读者印象也就越鲜明。

北朝时，北方有一首民歌叫《敕勒歌》，歌曰：

敕勒川，阴山下，  
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据《乐府诗集》引《乐府广题》云：“其歌本鲜卑语，易为齐言。”齐言，就是山东话，现在山东沂蒙山区的民歌里还保留着最后一句：风吹草低见牛羊。

这最后一句写得极其生动形象，我们仿佛看到了长风吹得茂草波浪起伏，在茂草低伏之际，又发现肥壮的牛羊在吃草。如果改为长风呼啸，牧草繁茂，牛羊肥壮，也能表达出这样的意思，但却不会给我们鲜明活动的形象画面。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静止的、孤立的描写，不易构成生动的画面。而将风、草、牛羊联系在一起写，互相制约，互相映衬，产生整体感，